


CLASSIC
现代学术
经典精读



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

主编 乔治忠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

ZHONGGUO SHIXUESHI JINGDIAN JINGDU

主编 乔治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 / 乔治忠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04-040685-5



I. ①中… II. ①乔… III. ①史学史—中国—文集
IV. ①K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8894号

策划编辑 梁宝贵
责任校对 刘春萍

责任编辑 梁宝贵
责任印制 张福涛

封面设计 李小璐

版式设计 赵阳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42.25
字 数 68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0685-00

学术经典的文化使命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总序

张岂之

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邀请我写几句话。我觉得，通过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些有新意的经典读物，有助于传承、弘扬和创新优秀的中华文化，我乐意承担撰写序言的工作。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中华文化凝结成为丰富的文化经典，亘古弥新，值得后来者不断发掘探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系列类似的著作带有研究的性质，比如研究《老子》的《解老》、《喻老》（见于《韩非子》），研究先秦诸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尸子·广泽》、《史记·论六家之要旨》，后来更有系统探讨学术源流与道统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著作。这些成果一方面在梳理中国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另一方面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学术精神，比如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在中华学术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连绵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文化传承与创新得以世代相传。这也叫做文化的“道统”，这个道统在今天应当发扬光大。

时至今日，学人们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视野更加开阔，资料更加周详，方法

更加新颖，文字更加平实，形式更加多样，文风更加规范，所凝聚的学术成果，同样也是人们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要参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是有价值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本丛书所选著作、论文都是臻于完美、无以复加了。实际上，有研究经历的人就能明白，学术研究本是一个不断传承、推进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在个人或团队的努力下，前后相继，共同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所以往往难以用僵化的思维去考量丰富多彩、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本身。这启示我们，面对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名著名篇，我们应尽可能发挥它们的榜样和示范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者提供参考和借鉴，使它们在承传文化精神、创新研究成果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不能仅仅从研究形式或规范方面去估价这些成果，尽管规范和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层面。

我有这样的体会，在学术研究方面，需要有包容与会通的精神，这样就给新课题、新探讨提供了可能，使学术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种相互辩驳的学术精神和理念，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发凡》中明确地指出：“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均要继续往开来，不断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中国古代学术著作，在梳理学术流变的过程中，侧重学术的继往开来，袭故弥新，“以复古为解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穷本溯源，辨别考证，展现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成果。正是这种订正增补，反复斟酌，使中华文化长河滔滔不息，绵延不绝。即使在民族遭遇重创的危急关头，中华文化中卓越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鼓励世人勇挑重担，成长为民族发展的脊梁。因为，学术研究和文化经典承载有不朽的文化精神，所以学术兴替往往被视作民族精神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引导人文学科的研究生阅读以往的经典和名著，不仅仅在于丰富专业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使自己的精神受到优秀文化精神的熏陶，这将是更加重要的教育目标。

以上写了这么多的话，无非是想说明在学术研究的作品的研读中，应注意凸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我想，对“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的宗旨和意义应有这样的理解。

“现代学术经典精读”系列丛书，旨在向研究生传播文化知识和科研经验，提高研究生的学术鉴别能力和学术素养，为研究生以及青年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帮助。

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所涉文、史、哲、艺术等学科。每卷主编都是该学科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选文尽可能突出学生必读的著名论文（或经典著作的节选），侧重20世纪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读者较难获得的论著。丛书编者希望所选论著大体上能反映学科研究的学术史体系，简要展现学科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前言由分卷主编撰写，主要介绍该领域学术史概况及论著遴选标准等，并对所选作品进行介绍和点评。每篇选文后附延伸阅读文献篇目。这使该丛书具有提纲挈领、扩展延伸的双重功能，编选应是有特色的。可见，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系列丛书，经过深思熟虑，又有在人文学科方面具有丰富教学、科研经验的专家学者主持，不但有益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发展，而且为大学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提供了一种实施的途径，值得支持。

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学术作品中甄别筛选出有代表性的精华论文或著作，的确并非易事，也难以避免吞舟是漏、取舍失当的不足。希望这套丛书能为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提供文化和研究的滋养，也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本丛书的编写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

是为序。

2012年12月

目 录

001 / 前 言

011 / 梁启超与《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032 / 郑鹤声与《正史总论》

058 / 金毓黻与《论史官制度及其任用法》

068 / 白寿彝与《漫谈史学传统三事》

078 / 施丁与《中国史学经世思想的传统》

101 / 杨翼骧、乔治忠与《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

121 / 吴怀祺与《论中国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 138 / 陈其泰与《论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扬弃》
- 158 / 白寿彝与《司马迁与班固》
- 197 / 钱穆与《袁宏政论与史学》
- 215 / 周一良与《魏收之史学》
- 246 / 杨翼骧与《刘知幾与〈史通〉》
- 281 / 瞿林东与《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
- 306 / 谢保成与《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
- 321 / 张孟伦与《宋代统治阶级在撰修国史上的斗争》
- 353 / 赵吕甫与《欧阳修史学初探》
- 377 / 柴德赓与《〈资治通鉴〉及其有关的几部书》
- 398 / 葛兆光与《明代中后期的三股史学思潮》
- 417 / 王德毅与《由〈宋史质〉谈到明人的宋史观》
- 437 / 方甦生与《〈清实录〉修改问题》
- 450 / 黄爱平与《王鸿绪与〈明史〉纂修》
- 467 / 乔治忠与《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

- 489 / 仓修良与《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 507 / 杜维运与《赵翼之史学》
- 526 / 吴泽与《魏源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魏源史学研究之一》
- 566 / 潘振平与《〈瀛环志略〉研究》
- 590 / 汪荣祖与《梁启超新史学试论》
- 604 / 胡逢祥与《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
- 631 / 朱云影与《中国史学对日韩越的影响》
- 659 / 索引

前 言

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萌发，此后发展则连续不断，渐趋繁荣兴盛。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维，惯于笼统、涵括、包吞总揽，而不着意于分门别类、专科探讨，因此研究历史学发展状况的史学史专门学科产生很晚，乃是在近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才诞生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首先应当了解中国史学史学科走过的历程，明晓史学史学科的性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任务和研究内容，理解当前学科发展的需要，以此掌握要领，取得“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举一反三、登堂入室的效果。

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任务和研究内容

顾名思义，史学史就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的学问，是将历史学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史。历史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因此史学史也要探索历史学与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史学发达兴盛，官方和私家皆热衷修史，历史记载和历史著述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形式多样；史学的社会功能明显，史学与政治联系紧密，直接成为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

学在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①史学遗产的深厚积累，不仅使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为十分必要的文化事业，同时也为这门学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若不重视史学史研究，则为学术结构的一大残缺。

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需要明确其学科任务，了解其研究内容。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任务可以概括为三项：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规律。

1. 清理史学遗产。这是史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国是史学遗产最为丰富的国家，多种体裁、多类内容的史籍浩如烟海，古代散见于经部、子部、集部诸书中的历史评论、史学批评、史学议论多不胜数，近现代发表于报刊的史学撰著绚丽多彩，此皆为卓有中国特色、富于理性精神的文化财富。清理史学遗产包括这样一些工作内容：搜集、发掘各种类型的史学著述以及相关资料；分析历史著述的内容和形式；考察史籍的史料来源、撰述过程、可信程度；探寻历史著述蕴含的史学观点、思想倾向等。这是一项有考订、有分析、有评价的综合性工作，因此可能取得很显著的研究成果。

2. 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此项任务是在清理史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特点是将历史学产生、发展和各个时期基本状况，予以条理化、系列化的叙述与评析，这就要求把清理史学遗产的各个知识“点”联结成包括时间先后在内的有序的线索。这不等于各个“点”的简单相加，而是充满了对不同或相同时期史著、史家、史学现象的对比分析和总结概括，指出其间的联系以及与社会环境间的联系，剖析活跃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评述史学的社会作用，对于有代表性的、开拓性的史家和史书，予以重点的研究。阐明史学的演进过程，使史学史研究真正具备独立学科的性质，从而与目录学的史籍解题、人物传记中的史家介绍以及其他相邻学科区别开来。

3. 揭示史学发展规律。历史学的系统一经形成，它的发展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内在的动力，而且参与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机制之中。揭示史学的发展规律，就是要探讨史学发展的社会条件与内在原因，剖析历史学在不同阶段的运行机制，这需要在史学史研究相当深入的基础上，通过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逐步解决。

这三项任务不是互相分离的，前项是后项的基础，后项是前项的指导。只有对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史学遗产做出一定程度的清理，才能较好地阐述历史学的演进过程；对史学演进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才能探讨史学发展的规律；在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中，才能更深切地理解史学从古至今的演进状况。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简述如下：

1. 历史观。历史观是对社会历史的概括性看法，系统化的历史观即历史哲学，或称历史理论。史学史研究不能将所有的历史观问题囊括其中，因为那是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而对于史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观如“五德终始论”、“正统论”等，应当作为史学史的研究内容，而重要史家的历史观融入其历史著述，影响深远，也不能忽视。

2. 史学思想。史学思想是对历史学本身的认识，涉及历史学的性质、功能、治史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论问题。例如撰史目的是作为“名山事业”还是经世致用？史学的功能有哪些？史家必备的条件和素质是什么？怎样对待记载求真与史学致用的关系等。史学思想的系统化即史学理论，一定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声势较大、影响广泛的史学思想，即可形成史学思潮，皆可广义地统属于史学思想的范围之内。

3. 历史编纂学。历史编纂学是关于编撰历史著述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学问，既涉及史书的编写形式、结构安排，又涉及史书的内容取裁和文字技巧，如史料的整理、鉴别和筛选，对史文的斟酌等。探讨以往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状况，是中国史学史的主要内容之一。

4. 官方史学及其相关的制度与举措。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独有特点，影响及于朝鲜半岛与日本，成为与西方古代史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官方史学的成就和影响，足与私家史学匹敌，且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主导地位。

5. 史家的史学活动。史家的史学活动是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等类内容具体、生动、活化的体现，与其政治活动、其他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不能截然割裂。因此，研究史家史学活动与研究官方史学活动一样，是史学史中特别具有综合性、写实性的内容。

6. 史学评论。史学评论是对历史著述进行诸如材料真伪、结构优劣、成就高低、影响大小等方面的判断和论证。史学评论的问题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史籍，有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考证。史学评论既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研究手段，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既要以史学评论的方式研究史学著述，也要研究过去史学发展中出现过的史

学评论。

7. 史学与其他社会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这是指史学史研究必当汲取哲学史、思想史以及历史学各门专业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同时也将自己的成果置于其他关联学科的知识系统中检验与定位。剧烈的社会动荡、声势较大的社会思潮，都对史学发展施加显著的影响，史学史研究对于诸如此类其他专业研究的问题，需要予以适当的把握和重新审视。

8. 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中国史学之所以十分繁盛，必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考察史学在古代中国产生、发展的社会机制，即探讨史学需要在什么社会条件下产生、存在和持续发展？中国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方式如何？史学的特定发展模式会形成哪些文化特征？这要比分析具体史学现象与某种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更为深入与宏观，更加“长时段”，势将触及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以上八项反映出中国史学史内容的类别结构，这些内容互相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中，学术任务与研究内容的这两层结构，是其学术体系的基本体现。真正理解和掌握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内容，在具体的学习与探讨中就会具备清晰的思路，同时将之转化成为一套得力的研究方法。

中国史学史的产生和学科建设历程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对史籍编纂状况的追述和评议，这类似于史学史的内容，但古人的追述和评议都是片断、支离和非自觉、不系统的，而且附属于历史撰述、目录之书或其他著述，没有独立地位，因此谈不上史学史学科的形成。西方学术的传入，其重于专科探讨的治学风格逐渐发挥影响，是为史学史等具体人文社会专科的产生背景，惟其过程依然是缓慢的。1919年，日本留学回国的朱希祖（1879—1944）曾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①转年他出任史学系主任，反而将课程改称为“中国史学概论”，虽有加强理论化的动机，但实际内容基本依旧，终究还是淡化了中国史学史的学科意识。192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其中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概括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这是近现代最早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专文。1926—1927年梁启超又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中《史学史的做法》一节，提出把史学史作为一种

^① 《文本科史学系三二一学年课程时间表》，《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4日。

专门的学科，探讨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他认为中国史学史应注意四方面问题，即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这种见解虽尚属粗放，但毕竟思考了建立史学史学科的理论问题，影响颇大，对当时史学史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梁启超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然初具规模，除梁启超初步提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之外，一些著名学者如陆懋德、蒙文通、郑鹤声、姚从吾、金毓黻等，皆在大学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中国史学史方面的学术论文及专题论著，也陆续丰富，不仅对司马迁、刘知幾、司马光、章学诚等重点研究课题有了较详细论述，而且具备了一定的研究广度。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十部左右的史学史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应麒、金毓黻分别撰写的两部《中国史学史》。魏著是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史学史专著，金著是一部内容充实、论述全面的著述，显示了作者在史料上的深厚功力。此外，许多题为“史学通论”、“史学概论”的著作中也多设有专章论述中国史学史。

1949年以后，内地历史学在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改造，在学科建设上，史学史研究被忽略或被视为不急之务，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重新得到提倡。1957年，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经修订重新出版，但删去最后一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仅为古代部分。杨翼骥发表文章《三国两晋史学编年》^①，按年月顺序汇集、整理了三国、两晋时期史学活动、史家生平、史书编纂及其他史学史方面的资料，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考辨。1961年，教育部委托白寿彝、吴泽编撰高等学校中国史学史教材。同年，《学术月刊》第10期发表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引发了全国对史学史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最初几年，国内发表的史学史方面的论文相当可观，涵括了对古代著名史家、史著的研究，还有颇多不同观点的论辩。白寿彝、吴泽、杨翼骥、朱杰勤等人均在大学内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使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局面。但是到1966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再次停顿。

1977年之后，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步恢复和发展，中国史学史也日益受到重视。1978年恢复研究生的招考，史学史专业乃与其他专业同步进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① 见《南开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新起点。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史学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史学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建立起来。1985年前后，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4个史学史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杨翼骧（南开大学）先后招收史学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史学史研究人员的培养进入新的阶段，对专业队伍的壮大起到关键性的促进作用。20世纪90年代，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成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的8个二级学科之一，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史、考古与博物馆学等并立，这表明史学史的重要性得到了权威认定。在这一系列学科建设活动中，贡献最大者当首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先生。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无论何时何地，上至学术管理层次的会议，下至与学界友人的私下谈话，加之在多所大学的演讲和多种报刊上发表文章，都大力强调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性，这是史学史专业能够获得历史学二级学科地位的关键性因素。北京师范大学也一马当先地扩展了本学科的研究队伍，创办了《史学史研究》杂志。^①该杂志随后发展成为国内重要的历史学核心刊物。2000年，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成立，同年经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瞿林东先生主持史学史研究中心的工作。他秉承白寿彝的治学方针，放眼全国的史学史学科发展，积极、主动、自觉和有力地支持、扶助各个高等院校的史学史学科建设，以点带面，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力量的壮大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论文和专题论著层出不穷，十分丰富，开拓了许多新的研讨内容，成果相当可观。这些中国史学史撰著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如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白寿彝主编六卷本《中国史学史》、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等。对照阅读其中两三种，极有助于系统地掌握中国历史学的整体演进过程，而这对初学者十分重要。另外，杨翼骧原作，乔治忠、朱洪斌订补的四卷本《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用按时间顺序编纂史料的方式来展现中国历代史学的状况，颇可嘉惠于初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人。

^① 白寿彝于20世纪60年代初创办《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后于“文革”运动中停刊。1979年复刊，改称《史学史资料》杂志，1981年又改称《史学史研究》，并且正式出版发行。

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因为社会状态和学术体制的不同，没有经历内地那样的起伏和波折，但近30多年间，也没有像内地这样取得与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并列的学科地位，大致是承接1949年之前的研究继续进行。总的看来，我国港、台地区有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发表，也有不少专题的、断代的论著出版，但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较少，专门矢志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者也很罕见，这与港、台地区未能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独立学科地位不无关系。值得提出的是原台湾大学教授、香港大学教授杜维运，毕生专注于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著有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及多种专著，对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和欧美学界也早就注意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发达和史学遗产的丰富，断续有一些具体研究专题的力作问世。在日本，著名学者内藤虎次郎曾撰著《中国史学史》一书，是同类撰述中的佼佼者。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从上古到清代的史学，篇幅较大，涉及面宽，有独到见解，可谓是外国人撰写的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之典范。但从整体观察，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重心仍在中国内地，这是依存于本土学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

近30年，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辉煌的时期，对古代和近现代的主要史家，几乎都有研究专著或专题论文集出版，发表论文之数量尤其众多。但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史学史定位于二级学科之后，并未能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等二级学科获得可比的建设和发展。其主要表现有：全国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业队伍仍然弱小；多数高校的历史系，安排中国史学史的本科教学课时过少；各级学术管理机构、教育管理机构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支持和投入明显不足；史学史专业内也需要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和研究深度，特别是亟须树立重新审视以往一切历史研究历程的学术信念。

梁启超说：“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瞭。”^①历史学的“历史演进之迹”，就是史学史学科的内容，历史学科领导人和历史学者，焉能对史学史学科不甚了了？笔者曾在《史学吟》^②一诗中写道：“学史不知史学史，识见难言浅与深！”即合于梁启超的上述语意。研修历史学的青年学子，阅读一些中国史学史的论文、论著，是非常必要的。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史之改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② 载《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卷末附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关于本书的选文安排和阅读方法

本书作为“现代学术经典精读”丛书之中的分册，遵从统一规定，即选取本学科 2000 年之前的优秀论述，并且加以“导读”，这项工作实际是相当困难的。其一，从数量巨大、浩瀚纷繁的专业论文内选录 30 篇左右的作品视为“经典”，难以执掌明晰的、一致性的标准；其二，本书范围之外的 2000 年之后论文，也许正好具有补弊救篇的学术价值，因为学术发展有如后浪推前浪，甚至日新月异，任何曾被赞誉的学术旧作，都可能显现出不完善和讹误之处。故此本书的选文，主要从以下六个因素来考虑：（1）论文在发表的当时可谓水平高、影响大，但影响虽大，争议至今未决者，如《左传》作者问题、《尚书》时代与真伪问题等，暂付阙如；（2）论文作者在史学史学科整体建设中很有贡献；（3）论文论点刷新观念、改变旧论，而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质疑；（4）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开拓性，或者是高水平的综合性、总结性论述；（5）在争议较大问题上持平允、客观的态度；（6）论点不因非学术性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颇。这六项条件，可以单项独当、也可互有补衬或相互制约，并无首要和次要之分。

如果将中国史学史划分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阶段，那么比较而言，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要比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更为成熟。因此本书选录的论述，属于古代史学史范围者为多，而即使如此，还是无法涵括古代所有重要史家、史著和重要的史学事项。选文之书不可避免的共同局限，是只能示例而无法求全，本书的选文也同样无法展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和全貌。补救之法，除了适度选录一些宏观、综合性论文之外，还有必要在此略述中国传统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大概状况。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西周克商之后，仍然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统治者开始忧思殷商败亡的原因和避免覆辙的办法，这称作“殷鉴”，即从殷商的盛衰中汲取鉴戒。“殷鉴”是一种历史的思考，带动了历史档案文献的保存和编辑，激发出一定的史学意识，但史学的真正诞生，是从西周末年按时间顺序连续记录时事政务起始。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也都有了编年体历史记录，今存《春秋》一书就是鲁国的历史记录。战国时私家学术大兴，私家史学也异军突起，《国语》、《左传》等，已经超越了官方历史记录的水平。西汉的官方史学活动没有大的发展，而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私家史著，则取得重大成就。《史记》不仅在编纂方式上创造了纪传体通史，而且在史学宗旨上突出个性精神，试图开辟新的路径。不过，东汉时期无论是班固的《汉书》还是官方纂修《东观汉记》，都是将史学宗旨拉回先秦传统